

历史转变中的思索

邵华泽著



5



2 021 1636 1

历史转变中的思索

邵 华 泽 著



历史转变中的思索

邵华泽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260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3 000

ISBN 7-5065-0793-5/D·82

定 价：4.20元

目 录

写在前面·····	(1)
理论工作要充分发扬民主·····	(3)
共产党员应当重视理论学习·····	(13)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	(19)
实现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	(56)
重视计划生育的宣传·····	(64)
坚持真理 依靠人民·····	(76)
在实践中坚持党的指导思想·····	(81)
党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而奋斗的七年·····	(89)
加强国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可靠保障·····	(113)
唯实·全面·依靠群众·····	(124)
——学习陈云论著中的哲学思想	
指导改革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137)
——学习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实事求是思想的新发展·····	(153)
——学习《邓小平文选》中的哲学思想	
维护新闻真实性必须消除“文化大革命”遗毒·····	(168)
实事求是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品格·····	(173)
提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	(178)
部队精简整编教育的思索·····	(184)
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军事宣传·····	(189)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220)
《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的几个特点·····	(244)

部队政治教育必须进一步改革·····	(282)
赞“自己动手”·····	(301)
“我是解放军”·····	(303)
“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304)
从钱学森的建议说开去·····	(307)
拣要紧的说·····	(310)
盼·等·做·····	(311)
不能到此为止·····	(313)
请准备一下·····	(315)
假如我是一个战士·····	(316)
“大家看着我”·····	(317)
沉得住气·····	(319)
多给这样的方便好·····	(321)
机关工作要有益于部队建设·····	(322)
“舒服”和“上当”·····	(325)
多研究如何节约时间·····	(326)

写在前面

再过几个月，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这十年，是拨乱反正的十年，是改革的十年，是迎着各种困难前进的十年。十年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十年，在我们党、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十年变迁，我们这些当代的人感受很深，后人在写历史的时候，也一定会作出公正科学的评价。作为军队的一名宣传、理论工作者，跟随着历史大转变的脚步前进，也在努力学习和思索。这期间写了一些文章，作了一些讲演，就记录了自己思索的轨迹。这些文章和讲演，一部分已收集在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生活与哲学》的文集里。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有些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有的在内部刊物上登载过。这次成书，都保持了原来的面貌。

做宣传、理论工作的同志，需要经常发表意见，可又往往怕公开发表意见，这种情况是过去“左”的错误政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是非正常的心理。今天情况、气氛已大不相同，但不能说这种心理就没有了。我个人信奉的是两条：第一条，公开发表意见要采取认真、慎重、负责的态度，至少是经过独立思考，自己想清楚了，认为是有道理的、正确的，才去写，去讲。这样，事后实践证明意见确有错误，自己也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失误，便于反思，从中得到教训，有所长进。第二条，既然意见已经发表出去了，报刊上登了，反正白纸黑字，那就让人家去评论吧。对别人的意见，则实实在在地按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八个字去做。这是二十几年办报生活中逐渐悟出来的一点道理、一种

思路。因为新闻工作也同有些同志形容电影工作一样，是“遗憾的工作”，报纸天天要出版，每天一大张，一早就印发出去，想修改也收不回来了，那就只能让千百万读者去议论、检查。如果办报的人不采取上述那样一种态度，那工作就无法干甚至日子也无法过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把自己这些作品汇集成册，奉献给读者，欢迎批评、指正。

邵 华 泽

1988年8月6日于北京

理论工作要充分发扬民主

去年五月以来在报刊上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的大事；对于发扬理论民主，活跃思想，冲破林彪、“四人帮”长期禁锢所造成的思想理论界的窒息空气，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场讨论，打破了多年以来人们不敢碰的许多理论禁区，重新恢复了实践的权威，确认检验任何一种理论，检验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言论之是否真理，都只能依靠千百万群众的实践。这场讨论，因为它说出了真理，极大地满足了人们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要求，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支持。它证明了，按少数人喜欢不喜欢来判断理论文章是否正确，靠少数人的“长官意志”解决理论问题那样一套违背理论民主的作法，是行不通了。这种良好风气的出现，预示着党的理论工作将有一个生机勃勃的发展。

理论民主问题，十分重要。可以说，没有民主，就等于取消了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就不可能了。

理论民主，当然是整个民主生活的一部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健全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了，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民主。这是一个大前提。但是，理论工作有它自身的特点。充分认识这些特点，就会理解为什么理论民主是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

首先，理论属于思想，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对待理论问题，象对待人们的任何思想问题、精神世界问题一样，只能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行不行呢？不行。并不是掌握

权力的人，对理论问题的看法就一定是真理。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理论观点，反对另一种观点，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即使你要推行的这种理论是对的，也不会产生好的效果。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行不行呢？也不行。真理有时候不在多数人手里，这种情况历史上很多。如果以一时的多数就判定为真理，一时的少数就判定为谬误，不但会颠倒是非，而且会压抑人们特别是先进的人们探索真理的勇气，对理论工作是非常不利的。理论本身不能检验理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作为一种理论观点，往往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实际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形：一种观点，一时看是错了，但经过一段实践再回过头去看看，证明并没有错，或其中有正确的因素；一种理论，一时看很有道理，但经过反复检验，证明在实践中行不通。所以，对理论问题，不能图一时痛快，匆匆忙忙下结论；更不能动不动就把一种理论著作、一篇理论文章定为“毒草”去锄，定为“谬论”去批。这里需要的是充分自由的讨论，还要允许作者保留自己的理论观点。这样，才能有理论研究空气的活跃，理论工作者的才华和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其次，理论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的工作，它要求人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社会历史各个领域的实际，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它要求人们对新出现的问题、新的经验，作出理论概括，提出新的观点、见解，因此它也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简单地复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结论，照抄照搬党的文件上的词句，都不能算是理论研究。而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由于受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种种限制，这种认识经常是通过曲折的道路，难免会出现那样的错误。即使一个同志有良好的愿望，也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研究问题，仍有可能由于认识上的某个环节考虑不周而发生理论上的疏忽或差错。对理论上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这是发扬理论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种是不承认“难免

论”，不允许犯错误，一有错就打棍子，进行压制，结果，只会窒息学术空气，使理论工作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那还有什么理论研究可言呢？一种是承认“难免论”，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使理论工作者敢想敢说敢做，使党的理论工作生气勃勃，不断有所创造。革命理论是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中发展的。因此，要重视正确的成功的经验，也要重视错误的失败的教训。如同打仗，打胜仗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战争的规律，打败仗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战争的规律。一个人理论上有错误，不是宣布一下“你错了”就完事了，更不要着重去追究个人的责任，而要深入地研究是在哪个环节上搞错了，细致地找出其中的教训，使以后可以少走弯路。一个同志在某一个理论问题上出了差错，不要因此就否定他的一切。在批评一种错误意见的时候，一定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不发扬民主，不准人家犯错误，结果是思想僵化，死水一潭，错误越来越多；充分发扬民主，允许犯错误，正确地对待错误，结果理论战线生动活泼，思想解放，倒可以减少错误。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个辩证法的道理。

最后，理论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是带根本性的影响全局的东西。因此，对待理论问题，尤其应发扬民主，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要发展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工作，光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还不够，还要结合国际国内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具体情况，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制定切合实际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发扬理论民主是重要的环节。列宁曾经清楚地说到了开展理论讨论对于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

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204页）对理论问题要展开民主讨论，各种观点、见解之间展开辩论，进行比较，就可以达到比较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这里，平等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平等的态度，形式上也讨论了，实际上只有批评的自由，没有反批评的自由，说服变成压服，辩论变成批斗，那当然就不可能做到畅所欲言，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探索真理。在重大理论问题上采取轻率的态度，几个人或一个人说了算，一出口就是结论，一作出结论就是终极真理，不容置疑，不容争辩，那就容易搞错，结果会给实际斗争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充分发扬理论民主，不仅是一个领导者对理论工作应取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也是一个郑重的党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表现。

毛泽东同志在理论民主问题上，有过许多论述，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这个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他还强调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周恩来同志的民主作风是我们学习的典范。1961年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不仅发展了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而且对民主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这对我们党的理论工作也有重要的意义。他特别强调造成民主风气要从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的领导同志做起，他说：“我们要造成民

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这话说得多么重要，多么好啊！

可是，一个长时期里，林彪、“四人帮”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对广大干部和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双百”方针被他们彻底地抛弃了，理论民主也被他们疯狂地践踏了。结果，学术风气被搞坏了，党的理论工作没有生气了，理论人才生长不起来，理论本身自然也就停滞、落后了。今天，如果我们不对他们的罪行加以清算，不把围绕着发扬理论民主问题的一些是非加以澄清，理论工作前进的步伐就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

下面，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一、理论工作同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

理论战线的工作同政治斗争当然有密切的联系。一个人搞理论研究、理论宣传，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宣传而宣传，不管自觉与否，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实际斗争、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理论工作者提出一种观点、意见，也总是要受自己的立场、世界观所制约的。但是，决不能因此把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划上等号。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首先是一门科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用贴政治标签的办法去代替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是不能有真正的科学的。我们要求的是科学性与党性的统一，不能离开科学性去讲党性。一种理论，首先因为它是科学的，正确的，才能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斗争实践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本来我们应该反对两种倾向，既要反对理论研究脱离实际斗争的倾向，又要反对把理论问题简单地当成是政治问题的倾向。可是，长时期中，只是一个劲地反前一种倾向，根本不反后一种倾向，结果是把什么都说成是政治问题，不承认有学术问题，理论问题。这也是极左的一种突出表现。林彪、“四人帮”成天高喊理论为政治斗争服务，实际上就是要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笔杆子”为他们实行封建专制主义“造舆论”。理论问题等于

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等于敌我问题，这就是他们的荒谬逻辑。在这种高压之下，当然就谈不上任何的理论民主了。最典型的例子：1965年，姚文元同江青、张春桥合伙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报纸刊出后，在广大读者中，在学术理论界，就有许多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们一伙强词夺理、置人于死地的恶劣作风引起大家很大的义愤。《北京日报》在转载姚文元文章时，加了编者按，指出“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这不是很正常吗？《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专刊转载时也加了编者按，提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这又有什么不对？对一个剧本有不同意见，难道不能讨论？如果你的文章是真理，为什么怕反批评，怕辩论？可林彪、“四人帮”却把这种正确的意见作为整人的罪状，明明是他们自己用政治陷害代替学术讨论，却硬要诬蔑别人是什么用学术批判代替严肃的政治斗争。林彪、“四人帮”就是依靠这种卑劣的手段，打击迫害广大的理论工作者，摧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历史教训应该记取。象姚文元那样打着“理论批评”的旗号，妄图达到反动政治目的的人，一定要警惕，要揭露。但对人民内部不同理论观点的讨论、争论，必须采取“三不主义”。人民探索真理的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总之，在处理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时，既要注意到它们的联系，又要注意到它们的区别，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态度。

二、权力和真理的问题。

真理来自实践，不是来自政治权力。革命理论的源泉是千百万群众的伟大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不是少数人所能包办的事情，而是全党的事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结合，领导和群众结合，才能推动理论的发展。一个人握有权力，就在什么问题上都握有真理吗？当然不可能。如果一位同志当了领导，地位高了，权力大了，就产生错觉，以为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了，

那就很危险。因为这么一来，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就会滋生和发展，就不会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就要逐渐失去同人民群众血肉的联系，就听不得不同的意见，结果，就是真理碰到自己的鼻子上也看不见，甚至还常常把谬误当成真理，把真理当成谬误。毛泽东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们的领导干部说：“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正确”，“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运用人民给自己的权力，努力去寻找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绝不要滥用这种权力去拒绝真理，堵塞真理发展的道路。

当然，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领袖，他们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站得高，看得远，在党的理论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这决不是说，新的理论观点、原则，只能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提出，理论是非只能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裁决；也不是说，领导人每说一句话都是理论，都是真理，都不允许讨论。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是先知先觉，当然也就不可能“洞察一切”。他们对问题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也总是处在不断思考、酝酿的过程中，怎么能够一说出来就是金科玉律？他们所作出的一些判断出现了差错或先后矛盾，又有什么奇怪？可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普通常识，在一个时期里被弄得非常混乱。林彪、“四人帮”奉行的是强权政治，叫嚷“有权就有一切”，在真理观上当然也就是有权就有理，强权即真理。他们利用篡夺到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横行霸道，以势压人；他们信口雌黄，抛出一个又一个谬论，统统封为发展了的“真理”；在他们眼里，人民群众都是阿斗，在理论问题上没有任何发言权，只能向他们手中掌握的“真理”跪拜。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利用革命领袖在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大搞现代迷信，鼓吹“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他们摘引毛泽东同志的片言只语，作为绝对真理；或者把自己炮制出来的荒谬观点，也当作“最高指示”，迫使人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切理论研究、理论宣传

都要围着这个转，实际上就是要围着他们转。谁稍有异议，甚至动作稍有迟缓，就看作是大逆不道，就要加上“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毛泽东同志关于古典小说《水浒》的谈话，本来是回答在他身边给他读书的一位教员问到《水浒》一书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的问题时讲的，并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可姚文元根据“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随心所欲地把那一段话拿来胡乱发挥、大做文章，说什么“这不仅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随之，他们就以评《水浒》为名，大抓“党内投降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在那时，不要说是对他们的政治目的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对《水浒》本身的评价提出不同看法，也要被看作是反对马列主义，坚持修正主义，哪里还有一点民主的影子？

理论研究只服从真理。而在真理面前，人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不管职位高低、权力大小，在理论问题上应是谁有真理就听谁的。政府的法令应当坚决遵守，党的纲领、路线和决议应当认真贯彻执行，不这样，就不能保证党和国家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在理论工作中要鼓励人们独立思考，敢于探索，尊重人们创造性的劳动，坚决实行“言者无罪”的原则。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搞“一言堂”，什么问题一个或几个人说了算，一切从本本出发，试想一下，那样的理论工作还有什么生机？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会有什么发展？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事业还有什么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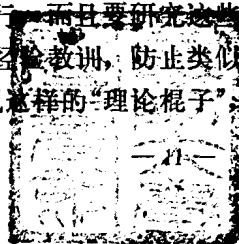
三、理论权威和“理论棍子”的问题。

无产阶级要不要自己的理论权威？当然要。我们需要的权威不是一个两个，而是要一大批。我们无论在哲学、经济、历史、文学等各个方面的理论权威，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同我们这样一个党和国家的地位，同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很不相称。

这正是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严重恶果之一。

我们所要的理论权威，不仅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对现实的斗争和历史的发展作出科学的说明；而且具有无产阶级学者的优秀品德：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工作看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为了人民的利益，既敢于坚持真理，也勇于修正错误，从不为个人的私利而出卖原则；他们用自己的理论创造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在群众中享有威望，但不自视高人一等，能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学术上的争论；他们在理论上取得了成就，但不故步自封，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能经常倾听实践的呼声，在不断解决新的问题、总结新的经验中丰富和发展科学的理论。这样的权威，是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不是人为地树起来的，是学术理论界和广大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

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们党内，有那么少数几个人，象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还有那个与林彪、江青关系非常密切的“理论家”，冒充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实际上是一帮封建法西斯的“理论棍子”、“理论恶霸”。他们以理论界的霸主自居，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公开扬言“不搞百家争鸣”，而要搞他们的“一家作主”，挥舞棍子，到处打人；他们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断章取义，无限上纲，随意把人整倒；他们依仗权势，强词夺理，一篇文章，一部著作，经他们一言定性，就不容反驳，“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把自己视为真理的化身，我就是党，我的话就是马列，顺之者都是“香花”，逆之者即为“毒草”；他们大兴文字狱，任意施行政治迫害和精神上肉体上的摧残，必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造成了无数的冤案、错案、假案。学术理论界吃够了他们的苦头，革命人民吃够了他们的苦头。今天，我们不仅要清算他们的罪行，而且要研究这些人得以发迹、得以生存的条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防止类似的人物来干扰和破坏党的理论工作，一旦出现这样的“理论棍子”



能够及时地识破他们，揭露他们。这本身就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很好地担负起来。

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在新的长征中，我们理论战线上的任务是很繁重的。无论是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理论，分清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无论是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无论是研究和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的新问题，都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都需要理论工作有一个大发展，都需要提高理论工作者的勇气，发挥理论工作者的智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特别应该强调发扬理论民主，把学术理论界的民主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让我们朝着光明的前途，继续前进吧！

(1979年3月)